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 对农民的发动和领导

王承仁 柏盛湘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在这次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民的发动和领导的程度如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粗略的考察,就教于史学界。

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其有限,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很薄弱,社会的基本群众是农民。革命必须发动农民,这是历史赋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使命。因此,如何看待农民所处的社会地位,对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处境抱什么态度,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发动农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比义和团运动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义和团运动前,由于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就整体而言是处在对立的地位,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对农民所处的社会地位有正确的认识。而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初步认识到农民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农民的极端贫困是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残酷压榨的结果,因而,他们对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对农民的贫困处境表示同情。《悲佃篇》的作者指出:“不独满人食汉民之粟也,即富民之役佃人,亦与明代无异。……田主之于佃人也,以十分取五为恒利”。但实际超过此数,因为“田主之下,另有征税之人,佃民于输租田主外,必兼有所酬,则所谓十分取五者,不过田主之正税已耳,征税之人所私取,又必五分而取二,则是农民终岁勤动,仍无以贍其身家也。”^①加之“鸡鱼麦菽,随田而赋”,“田主巡行田,责佃供张,酒食弗腆,恒致苛罚”。使得农民“春啖芋魁署预,夏煮牟麦为粥,乃至不得食,秋冬食少良,然饭中必杂梁粟,或以萝蕨。羹不盐,爨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号寒徯旦者,往往而有。”^②

革命派不仅指出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而且也揭露了地主与官府勾结,官府充当地主压迫农民工具的罪行。他们指出:“田主允其贲负,而啮骂弱击从之。佃民软弱,乃扰其鸡豚,毁其器具,仍坐督其偿。如有黠悍者,朝夕之间,庶儿避匿,而官役叩门矣。役至求贿,力可以贿,则恣所欲而去,无几何,田主嫉之复来,势当曳之行,徽缠杖梏,维官所欲施,置之陞牢,偿遽而后释。役及官,悉富人使令也。”^③地主之对农民,“甚至夺其田庐,使之不得践彼土,稍拂其意,则讼之于官,官吏畏田主之势,必怨痛其身,或荡产倾家而后止”。这样的农民,真是“名为佃人,实则僮隶之不若”。^④《说国民》的作者也说农民的处境是:“然虐之

以田主，虐之以官长，虐之以吏胥，虐之以土棍，务使之鬻其妻典其子而后已，然若辈不敢动也。朝廷派设官吏，以某官剥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辈不与闻也。……是率一国之农而为奴隶也”。^⑤ 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也指出：农民“荷锄垆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若辈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满洲人派设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犹著者也。是故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⑥

基于对农民所处的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地位的认识，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已把农民看成是可以参加民主革命的阶层，是可供他们利用和依靠的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即上等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他们认为上等社会——统治阶级，早已腐朽堕落，只知对内剥削镇压，对外妥协卖国，是革命的对象。中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最有知识，最了解国外情况，具有先进思想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下等社会——农民为主体的劳苦群众，是受压迫受剥削的阶层，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们说：“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⑦ 有的甚至认为：“天下只有穷人有革命的资格”。^⑧ 有的颂扬农民“于道德为最高”，“则亦起而为变，及其就死，亦甘之如饴矣”。^⑨ 他们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斗争事例，来说明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夫陈涉起于佣耕，刘秀兴于陇亩，邓茂七亦起自佃民，虽所图之业，或成或堕，然足证中国之农夫，非不足以图大举”。^⑩

由于革命党人认识到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因而明确地提出了革命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的主张。邹容的《革命军》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说：“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抵原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他以美国和法国为例来说明革命的胜利，是多数人斗争的结果。他说：“若华盛顿，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何如？一拿破仑何如？其有愈于华、拿二人之才之识之学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华、拿者不过其时抛头颅溅热血，无名无量之华、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国，固非一华盛顿、一拿破仑所克有事者。然必预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其庶乎有济。……而此无量无名之英雄，则归诸冥冥之中”。^⑪ 有的则大声疾呼：“我们穷苦的兄弟呀！你看历史上，办大事的豪杰，那一个不是穷苦出身？……若说起革命的英雄，头一个是陈涉，他也是做田地出身的；第二个是刘邦，他也不过是骊山的戍卒；只因被官府虐待得厉害，被那些有钱的人看得十分不起，一时涌上气来，跳起身子，做出革命的大事业。”^⑫ ……有的则认为：“盖革命出于多数贫民，斯为根本之革命。故吾人与中国革命，亦冀其出于多数之民，不欲出其少数之民，此其所由以运动农工为本位也”。^⑬

为了使农民的力量得以发挥，他们号召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们指出：“你看那外洋各国，他那一般种田的人，都结成一个大党。……所以外洋各国的农党，那势力顶大，皇帝是顶怕他的。因为他这一般的人，若不完粮，就可以制皇帝共官府的死命了”，要农民学习各国的农党，“赶紧乘这机会自立自强”。^⑭ 共进会也表示要以“全中国四百兆人”为联合对象。孙中山直接向香山的农民说：“记忆着，人们只有靠着结合的力量，才能够改善他们的地位呢”。^⑮ 还有的革命党人提出“合群”。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已开始认识到农民的巨大力量，他们要发动和组织这支巨大力量的意向。

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一方面看到了农民是一股巨大的力量，革命必须发动和依靠这支力量，同时也认为它是一个落后的阶级，必须要经过教育和改造，才能在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他们说：“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鍼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⑥有的则说：“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这时才能“一夫发难，万夫响应”。^⑦

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对农民教育改造，主要是指教育改造会党。他们这时一方面看到会党是农民为主体的劳苦大众进行斗争的组织，是可供利用的力量，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组织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必须要进行改造。孙中山提出的会党是民族主义的遗产，“是平民革命的基础，不可埋没，所以教同志赶紧加以整理和指导”^⑧的思想，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有的革命党人从义和团运动后会党在湘、粤、黔、蜀等地发动的多次斗争很快被清政府镇压的事实中看出：“私会之在今日，实有不能不变通之势矣”^⑨。如何变通呢？他们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曰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二曰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入之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三曰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羨之以新事功”^⑩。“故担任下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联络三种社会构成其统一之机构，而增进其活动之形势”。^⑪孙中山更是明确指出：“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识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⑫在实际活动中，革命党人对会党也进行了一定的宣传教育工作。如浙江革命党人，“多运革命书籍，传布内地”，“由是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中下二社会矣”^⑬。

可见，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已经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说话了。资产阶级要以领导者的身份发动、组织和改造农民，使之成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一支革命力量。这是近代中国由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进入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

对农民进行的武装斗争持何种态度，怎样认识有清以来农民所进行的反清反帝的武装斗争，这直接关系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敢不敢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的认识也有了显著的变化。

十九世纪末暴发的义和团运动，是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爱国的武装斗争。对待这次斗争，不管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是站在农民的对立面，对农民的斗争进行诋毁和谩骂。义和团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农民在斗争中所显示出的巨大力量，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受到了启示和鼓舞，开始改变了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和看法。1901年《开智录》上发表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孙中山的重要评论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是这种变化的代表。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作者首先肯定，义和团是帝国主义“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的产物，是农民“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的正义行动，强调指出：“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我国民精神可以从此振刷矣”。并要求从事革命活动的志士仁人利用义和团后出现的政治形势，“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

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则此际之排外灭洋者为义和团，安知顺手倾满洲政府，大倡改革者非义和团耶”。认为这是“国民创生之好时机矣，岂可失去之哉”！^②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一方面批评了义和团运动落后保守的一面，同时，更肯定了它的“自卫其乡族”的正义性质和“视死如归”的精神，看到了义和团的巨大力量，深受鼓舞地说：“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根据当时的形势，孙中山主张“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③有的革命党人则认为义和团的斗争是由于“德人横于胶州，民不能忍”，“驱此平素专事生产、重视身命之民人，相率赴于死地而不避，轰轰烈烈，万人一致以冲突于硝烟弹雨之中”，^④表现了对农民反侵略斗争的深切同情和勇敢精神的赞颂。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说明资产阶级对农民武装斗争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他们对有清以来的农民斗争的评价上。这时的革命党人把清初以来的反清组织称为革命党：“吾国清代之有革命党，以兴中会为嚆矢。在兴中会以前，非无革命党也。如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1780）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嘉庆元年（1796）鄂、皖、豫、湘各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等之白莲教，嘉庆十八年（1813）燕、鲁、晋、豫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之天理教，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皆可谓之革命党”。^⑤有的则把这些农民起义队伍称之为义师：“故自僭盗以来，朱一贵起于台湾，林清起于山东，王三槐起于四川，洪秀全起于广西，张乐行起于河南，其它义师，不可悉数”。^⑥对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洪秀全“不忍异族之蹂躏，振臂一呼，须臾下东南各省，建都金陵，可谓不世伟业”。^⑦伟大的孙中山对洪秀全更是钦慕不已，“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没有成功”，^⑧“心里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⑨为了借鉴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党人还认真总结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历史。刘成禺专门写了《太平天国战史》一书，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说：“洪朝立国，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伟绩，概付焚如，即洪门子弟，亦不详其事实，是可叹也。……洪门子弟，手此一篇，亦足证曾矩矱之遗，当世守其志而忽替，予亦有光荣焉”。^⑩很显然，就是要革命派把太平天国的未竟事业进行到底。

对二十世纪初暴发的农民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赞颂，并从中得到直接的鼓舞，增强了他们领导革命战胜敌人的信心。孙中山从广西农民起义中受到鼓舞说：“清政府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能与我匹敌，目前广西爱国分子的起义，就是一个证明”^⑪。章太炎则从农民斗争的发展中认识到革命是推翻清政府的救时良药。他说：“义和团初始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今日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并就此得出结论说：“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济，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⑫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有清以来农民武装斗争的这些评价和称赞，虽然多侧重于反清一面，其立论也未必都很科学，但这种对农民武装斗争的肯定，表明了他们有和农民建立联合关系，利用农民力量进行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意愿。显示了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思想的发展。

三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能否反映农民的土地要求，是检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认识的程度，和能否广泛发动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

关键。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看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危害，因而不少革命党人都在解决当时土地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农民要求摆脱封建剥削的强烈愿望。

革命党人陶成章手订的《龙华会章程》，鲜明地提出了“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及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资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呢”。^⑧章太炎则提出了“田不自耕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⑨主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⑩胡汉民在《民报六大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土地国有必使“地主强权将绝迹于支那大陆”。^⑪《悲佃篇》的作者对“然以多数之佃民，屈于田主一人之下，佃民之衣食，系于田畴，而田畴予夺之权，又操于田主”的现实，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提出了“故豪富之田，不可不藉，然欲藉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夫今日田主，均大盗也……民受其厄，与暴君同。今日夺其所有，以共之于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此则仁术之至大者也”。^⑫有的则在驳斥保皇派时明确指出：“而土地亦在少数人之手，以渔猎社会之资本，一为今日之大患。故知土地问题，决为社会问题之源，而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即为不能知欧美社会受病之源也”。^⑬这些革命党人的主张，在具体内容上尽管有异，但在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和要求废除地主垄断土地的问题上，则是共同的倾向。它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从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上，把农民斗争纳入到民主革命的轨道。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在当时革命党人提出的各种主张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年，1903年第一次作为纲领正式提出。1904年在反清秘密会社致公堂重订新章程时，明确规定要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把平均地权规定为群众性的秘密会社的宗旨，说明他不仅要用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去武装革命党人，同时也要用这个纲领去武装和发动革命群众。

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与他受到当时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的强烈刺激，和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但它是在同情中国贫苦农民的处境，企图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平等社会”的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本质上是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物。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记载他与孙中山的一次谈话说：“余曾与先生（指孙中山——引者）谈土地问题，因问曰：先生土地之说，得自何处？……先生答曰：吾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若吾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⑭章太炎记载1902年孙中山同他谈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内容说：“兼并不塞而言定赋，则治其末已。夫业者与佃耕者之利分，以分利给全赋，不任也，故取于佃耕者，率参而二。古者有言，不为偏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夫贫富斗绝者，革命之媒。虽然，工商贫富之不可均材也，……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无，故卖鬻者庚偿其劳力而已，非能卖其壤地也。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御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⑮梁启超说孙中山于1899年曾对他说过：“大乱之后，人民离散，田荒不治，举而夺之”。还说：“抑孙文尝与我言矣，曰：今日耕者，率其所获之丰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剥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⑯

这些说明，孙中山对地主霸占土地剥削农民是非常不满的，对农民的处境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之所以提出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就是为要改变这种地主霸占土地，造成贫富悬殊的

社会状况，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纲领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军政府宣言在解释同盟会纲领中平均地权一句时又强调指出，“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共弃之”。^④这个纲领由一个革命团体的政纲变成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纲，表明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把社会民生问题作为整个阶级的奋斗目标，要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力量的良好愿望。确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是带有共和国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⑤这个纲领由于本身的弱点而不能实现，但它的提出，却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农民的政治基础，表明革命派已从政治纲领上把农民斗争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

四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也把部分农民的反抗斗争，直接纳入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行列。

革命派发动和领导农民，主要是通过发动和领导会党的形式表现出来。会党的基本成员是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游民无产者大多是由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转化而来，其处境与农民相近，其穷困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则甚于农民。因而从阶级地位看，他们仍然属于农民阶级的范畴。作为一个秘密会社，会党不仅有反清斗争的传统，而且是近代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在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又不可能也不具备组织农民政党的情况下，这时的会党，仍不失为基本上代表农民利益，发动农民进行斗争的组织。

资产阶级革命派从革命斗争开始时，就非常重视利用会党。这一方面是会党具有反清斗争传统，容易接受革命派的反清主张。孙中山说他革命初期，“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⑥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而且会党本身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对群众有一定组织号召力，通过与会党的联系，可以带动一部分农民参加革命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与会党的联合上，做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明显的有：1899年11月，由兴中会发起，有三合会、哥老会参加，在香港举行的集会。会上决定成立兴汉会。这是革命党人与会党在南方各派系的大联合，它是革命党人同会党建立联盟关系的初次尝试。孙中山为这次联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后来说，为了这次联合，“予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总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合并于兴中会之事也”。^⑦华兴会为了联络会党，专设同仇会作为外围组织。同仇会设立后，“自是哥老会员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⑧光复会为了联络会党，主要成员都参加龙华会，而光复会也吸收会党的主要成员参加，把革命党的组织与会党比较密切的联系在一起。1907年，部分同盟会员为了联络会党，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成立后，计划“分头联络长江南北会党，以充实革命力量”。^⑨取得了“自有共进会以后，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成果，这就使同盟会增加了一个群众基础较为广泛的外围组织，从而有利于促进革命运动的高涨”。^⑩对北方的会党，革命党人也做了一些联系工作。1907年，宋教仁奉命到东北联络“马贼”，其首领

李逢春邀宋面谈，表示赞成革命派的革命宗旨，愿一致行动。宋教仁即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经常与之联系。此外，直隶保定一带的同盟会员，亦有投入在理教从事联络的。当时的情况是几乎没有一省的革命党人不从事联络会党工作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联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革命派充当了领导的角色。如1899年兴中会与长江及两广、福建会党的联合中，孙中山是公举的总会长。华兴会联络会党的组织——同仇会，是一种军事编制，革命党人黄兴任大将兼同仇会会长，刘揆一任中将，掌陆军事务，会党首领马福益任少将，掌会党事务。光复会把江、浙、皖的会党吸收到光复会后，进行编制约束，颁布号令，把各地会党编成为八军，革命党人徐锡麟等五人任“黄字号”，即第一级首领，秋瑾任“祸字号”，即第二级首领。共进会的领导成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它的第一任会长是同盟会会员、会党的重要领导人张百祥。这种革命派处于领导地位的联合关系，就为革命派发动会党及其影响的那部分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关系有了改善，与会党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联盟，因而辛亥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部分会党充当了革命党人策划和领导的武装起义的主力。1895至1908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在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组织的武装起义，大多是以会党及其影响下的下层群众为基本力量而进行的。此外，在斗争过程中革命派与会党建立联系的情况，各地均有。如山东，1906年曹州人民起事后，斗争形势日益发展，“学堂革命党闻东贼日盛，潜相结纳”。河南则是：“从前盗伙得财，均即表分，近则闻革命党为之主谋，所劫赃物积蓄一处，为购置军火，预备在永宁、内乡、裕州各山中经营巢穴，互相联络，志不在小。”在四川，会党首领温朝钟，“潜通革党”，“倡言革命”，于1910年攻占了彭水县城。广东会党起事与革命党人的联系更为突出。广州府属“沙所之匪名为堂匪，设立堂名，广联声气，……近联港澳革命诸党，远亦与（广）西省匪潜通”。1907年，刘恩裕、黄世钦等在钦属三那地方，借抗捐为名发动起事后，“勾结逆首孙汶（文），接济粮械”。1911年，又发生所谓“革命余孽勾结土匪扑扰佛山署”事。三合、三点、小刀、剑仔等会党，也纷纷“勾结革党，踴立师团，设堂打单，明目张胆啸聚乡村”。^⑥形势的发展确是“三合会于广东之内地，到处跋扈，……其中首领与新党相结托而为新党之爪牙，欲见机而动，与各处之党人通气脉……而新党中主义激烈之人，亦赖之以为羽翼，倘一朝会至，将赖此等之徒，以为举大事之前驱”。^⑦长江流域是：“长江千里，会党革命党纷纷串结，……大乱之刻，匪伊朝夕”。反动统治阶级对这种局面的出现非常恐惧和忧虑，惊呼曰：“顾昔则游勇土匪，其志仅在抢劫，今则勾结逆党，倡言革命，竟至谋陷城池，凶焰日张，剿办愈难措手”。^⑧这种会党与革命党联合武装斗争形式的出现，表明了一部分会党的斗争开始摆脱旧式起义的范畴，已被直接纳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它是武昌起义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到保路同志军，武昌起义后的各省独立过程中，各地会党和农民的斗争，有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直接策划和领导下进行的，有的则在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下，纷纷举行起义。这些起义斗争对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省分的独立，如四川、湖南、陕西、贵州等省，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联合的斗争则起了主要作用。所谓“清季的革命运动，简直是革命党联合会党的运动”。^⑨这个评价虽不完全符合辛亥革命的历史真实，但并非全无道理。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会党及其影响下的劳苦大众，不同程度地纳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轨道。

五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被推上了历史的大舞台，为了发动和领导革命，他们对农民所处的社会地位、作用和要求有一定的正确认识，并在斗争中有一定的结合。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其固有的特性——软弱性和妥协性更加突出。因此，在对待农民的一系列问题上，不仅认识上存在不少的问题，就是认识到了的，在行动上也并未认真实行。

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虽然在思想上认识到农民是可以参加民主革命的力量，但由于阶级的偏见，他们始终没有把农民当成自己的可靠同盟者来看待，只是把农民看成是可供自己驱使的力量。对会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提出了各种看法：有的说：“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无殊”，故“应联络以厚势力”。^⑤有的则认为会党与革命党是“同一排满宗旨”，会党势力是“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定，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⑥有的则认为，当时形势下的会党，“即民军不举，彼等亦必揭竿而起，不如联络利用，输以常识，免致地方糜烂，故亟与会党合谋，早日举义”。^⑦有的甚至说：“会党之志在抢劫，若果成功，反为所制”。^⑧有的则声称：“日俄不能用马贼交战，光武不能用铜马、赤眉平定天下，况欲用会党而成大事乎？”^⑨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藉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为原动力也”。^⑩这些，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会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必须利用的社会力量，但其基本点是轻视、鄙视甚至是诬蔑，或者把本身降低到旧式会党的地位。而在实际活动中，每当利用会党起义遭到挫折时，又总是把责任推到会党身上，认为“若论运用，则驾馭教门也易，而驾馭会党也难，欲得教门之死力也易，欲得会党之死力也难”。^⑪显得束手无策，只好另求它途。这些错误的看法和态度，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与会党建立了一定的联盟关系，但却貌合神离，不能成为真正的盟友，不可能在实际上对会党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改造。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在组织形式和政治思想觉悟还没有真正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需要的水平，有的会党甚至完全停留在原来水平上，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对于一般农民，革命派更没有去做深入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个别革命党人虽然在口头上也说过“运动工农为本位”，但他们基本上都还没有摆脱英雄史观的巢臼，从根本上轻视工农。而且，当时一般革命党人都认为，只要争取了会党就可以把农民带动起来，几乎把运动会党与发动农民划等号。这样，他们就很少到农民中去作宣传组织工作。如上所述，会党的基本成员虽然是农民、手工业者、游民无产者，它们的斗争也基本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但会党终究是只占农民中的少数，因此，发动了会党并不等于真正发动了农民。由于没有对广大农民做起码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因而辛亥革命时期的广大农村和众多的农民斗争，实际上是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有组织的斗争行列之外，农民斗争虽然是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之中，但大量的农民斗争仍然处于自发状态。这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中国内外学生团体，本党多注意组织操纵之，其它民众则仍只能利用，未能组织也”。^⑫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提出了反映农民要求的土地纲领，但并没有提出一个真正满足农民土地愿望的纲领，也没有打算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上所述，平均地权的提出，反映了革命派对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可是，平均地权并不是把地主土地变为

农民所有，即“并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已有”。^③严格地说，这个纲领只是解决城市土地问题的方案，就是这样的方案，也非常轻易地被他们抛弃了。本来，在同盟会成立通过政纲时，就有不少人对平均地权持保留态度。这反映在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势力从一开始就没有实行它的打算。同盟会外围组织，专为联络会党而成立的共进会，在1907年成立时，却公然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有的人则说平均地权是什么“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发动辛亥革命起过重要作用的中部同盟会，1911年成立时也只“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权为主义”，公开抛弃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这样，农民在革命中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利益，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广泛地动员农民参加民主革命斗争。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自己登台掌握一部分权力后，就立刻翻脸，站在农民群众的对立面，追随旧官僚军阀和立宪派反对农民，他们对农民自发向豪绅地主展开的斗争，不是支持，而是认为这是“行动越轨”，甚至用武力加以镇压。对农民的武装，他们则以什么“假革命”的罪名加以镇压和解散。对与它合作过的会党，也以其行动破坏了正常的秩序而横加取缔。当国内外反动势力向其发动猖狂的进攻，南京临时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依靠农民，扫荡农村的封建势力，把革命坚持下去的主张，而是企图以镇压农民来表示向敌人妥协，希图用这种手段来换取敌人承认自己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自己被排挤出政权，使革命遭到失败。毛泽东同志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④这是符合辛亥革命实际的科学总结。

* * *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理论上初步认识到农民是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提出了企图解决封建土地关系的反映农民问题的土地纲领，在组织上与会党建立了一定形式的联合关系，并共同进行了武装斗争等方面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领导，把农民斗争初步的纳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这是中国进入到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民轻视，对会党的鄙视，在实际活动中没有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没有提出能够满足农民要求的土地纲领，对已经起来进行反抗的农民也没有给予领导和支持，和在关键时刻抛弃农民等方面看，又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认识和实践，理论和行动是不一致的，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对农民的发动和领导，把整个农民纳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农民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最大的革命民主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广泛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从而也就不可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①②③④⑩⑬⑭⑰⑱⑳㉑㉒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752、788—789、788、752、754、952、712、755、754、673—674页

⑤⑦⑩⑬⑱⑲⑳㉑㉒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75、408—409、453—454、303、409、409、59—62、426、312—313。

⑥⑧⑪⑫⑬⑭⑮⑯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58、921、665—666、921、883—884、602、760页。

⑰⑱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514、378页。

⑳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册，第96页。

㉑ 《中山全书》附集《传记》。

㉒ 《陈天华集》第156页。

湖北省文学学会编辑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一期出版

《中国文学研究》系湖北省文学学会年刊。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师范学院三院校学报以丛刊方式出版。第一期由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印行。

第一辑收论文和资料三十篇，约三十万字。其中古典文学方面，有胡国瑞《江汉诗踪——李白在湖北》、石声淮、唐玲玲《论苏轼散文》、王启兴《杜甫景物诗艺术琐谈》以及王毅、张国光、孙续恩、唐异明等人的论文。

文艺理论和写作理论方面，有郁源《论艺术真实》、周伟民《古代“诗味”说发微》、王先霭《论诗体小说〈长恨歌〉》，及古远清、刘九洲的文章。

现代文学方面有杨平《读〈长夜〉随

笔》、易竹贤《鲁迅与“进化论”》、李恺玲《论鲁迅前期译介俄苏文学的意义》，以及文振庭、谢韵梅、王敬文、秦志希、李德尧、沈振煜的论文。

当代文学方面有冯天瑜《〈李自成〉农民形象塑造的成就与问题》、陆耀东《进向新的境地的足迹——柳青的创作道路之三》和刘守华、熊德彪的文章。

资料方面有郭沫若佚文《诗歌底创作》、闻一多集外诗九首、美国 Olge Lang 著《巴金和他的著作》中的一章《巴金青年的时期去法国》、沙汀著作系年和关于丁玲的资料二则。

(省文学学会)

- ⑮ 胡汉民：《七十二烈士成仁就是成功》。
⑳① 《辛亥革命》(三)第 25、62 页。
⑳ 《革命逸史》自序。
㉑②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 1：298 页。
⑳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㉑ 陈少白：《孙中山最初革命之言论与行动》。
㉒③④⑤⑥⑦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55、00、172、173、172、78 页。
㉓⑧⑨⑩ 《辛亥革命》(二)，第 504、15、541、78 页。
⑪ 《建国月刊》，第五卷第四期，第 10 页。
⑫ 《新民丛报》，第 4 年第 14 号《杂誉某报》。
⑬ 《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152 页。
⑭ 《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 86 页。
⑮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 504 页。
⑯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 95 页。
⑰⑱ 转引自《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第 224—227、227 页。
⑲ 《三合会之性质》。
⑳ 《哥老会研究》。
㉑ 《辛亥革命》(六)第 41 页。
㉒ 《欧洲同盟会纪实》。
㉓ 《毛泽东选集》第 16 页。